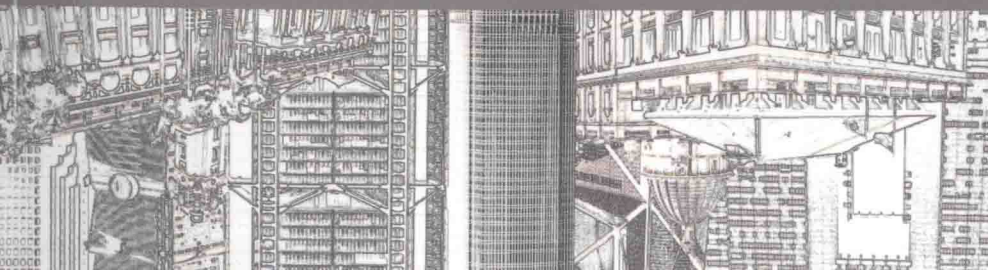


解讀臺港社會意向



蕭新煌 尹寶珊 王家英 編

香港亞太研究所



解讀臺港社會意向

蕭新煌 尹寶珊 王家英

編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2011

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叢刊第八十八號

解讀臺港社會意向

Interpreting the Social Ethos of Taiwan and Hong Kong

編者：蕭新煌、尹寶珊、王家英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地址：香港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印刷：卓利製作公司

版次：二零一一年二月第一版

國際書號：ISBN 978-962-441-588-9

© 香港中文大學 2011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序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與臺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於2000年開展一項長期的合作研究計劃，就雙方關注的兩地社會政治問題，進行定期的社會意向電話調查，並透過研討會交流研究心得。

《解讀臺港社會意向》是第四屆臺港「社會意向與社會指標調查研討會」的論文選集。歷屆研討會均由香港亞太研究所與社會學研究所輪流主辦，在臺港兩地交替召開，第四屆研討會於2008年8月29至30日假香港中文大學順利舉行。

在此系列研討會發表的部分論文，由香港亞太研究所陸續輯錄成書，迄今已出版了三本，第一本是《香港社會政治的延續與變遷》（2004），第二本是《社會發展的趨勢與挑戰：香港與台灣的經驗》（2006），第三本是《新世紀臺港社會風貌》（2008）。與前三本論文集頗具企圖心的標題比較，本書以《解讀臺港社會意向》為名，似乎過於平淡和樸實。其實，我們選這書名也有另一層的論述考量。

四屆以來，研討會的論文均立基於對探討不同主題的社會意向態度調查資料，因此，給予調查資料妥適的「解讀」，自是本系列研討會的最主要貢獻和最大挑戰。所謂妥適的解讀，我們有兩個標準，一是主題具有貼近當前社會局勢變動的意義，二是解讀方向具有足夠的宏觀脈絡意義。

回顧過去已收錄在三本論文集內的37篇文章，所涉及的議題範疇廣泛，也大多符合和直指上述兩個目標。但長期既成的主題畢竟較多，新興浮現的主題較少；只從單一社會脈絡去解讀者還是較多，須從比較時空脈絡才能充足理解者較少。

從本書四大部分的主旨範疇和文章數目：如風險與幸福（兩篇）、性別與家庭（三篇）、族群與偏見（兩篇）、民主與政治（三篇），以及個別社會探討（八篇，其中香港六篇、臺灣兩篇）或臺港比較分析（兩篇）來看，本書對臺港社會意向和民情動態的解讀，還是以個別正統社會學主題為主，如上述對性別、家庭、族群的探討便多過風險、外籍配偶、後殖民的民主；而且比較研究如幸福感和政治信任仍不成氣候。不過，作者想從較寬廣的社會政治脈絡去解讀的用心倒是愈來愈明顯，相信這對回饋臺港社會學的相關研究論述會有一定的貢獻。

我們喜見臺港社會學家的長期合作已走過十個年頭，學術交流和出版成果也不斷的深化和產出，因此我們決定從2011年開始，將原先只側重臺港社會意向和社會指標的研討會，擴大到包含其他主題的「臺港社會學」範疇。對此，我們樂見其成，也有更多的期待。

利希慎基金資助第四屆「社會意向與社會指標調查研討會」、香港政府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屬下的研究資助局資助香港2009年的社會意向電話調查（研究計劃項目編號：452508）和本書的出版，對此，我們深為感銘。伊慶春、章英華、楊文山、傅仰止和瞿海源等教授積極推動歷次社會意向電話調查，特此致謝。最後，香港亞太研究所的黃子為、賴樂媽、梁月蓮和陳韻晴協助數據分析和論文文稿校對等工作，在此謹誌謝忱。

編者

2011年1月

目錄

序	vii
---------	-----

第一部分：風險與幸福

1. 不同年代香港人對風險的看法 梁世榮	3
2. 他們幸福嗎？為甚麼？： 臺灣與香港民眾的比較，2000-2005 張芷雲	33

第二部分：性別與家庭

3. 臺灣民眾對娶外籍媳婦的態度變遷： 社會接觸重要性的再驗證 伊慶春、簡文吟、章英華	59
4. 香港社會對家庭功能和家庭資源認知的 性別差異 馬麗莊、王家英、劉玉琮	99
5. 香港男女在教育及工作層面的變與不變 鄭宏泰、黃紹倫	123

第三部分：族群與偏見

6. 社會偏見或社會距離：
就臺灣原住民與漢人間社會距離態度的討論
章英華 161
7. 香港南亞族群的教育境況：
一點觀察與討論
古學斌、陳錦華 183

第四部分：民主與政治

8. 在自由主義民主與實用性民主之間：
回歸後香港人對民主的理解
王家英、尹寶珊、葉國豪 213
9. 政治信任的現狀和啟示：
香港和臺灣的比較
王家英、蕭新煌、尹寶珊 237
10. 社會和諧、管治與公民權利：
香港實證研究的案例
王卓祺、王家英、何永謙 267
- 編者、作者簡介 289
- 索引 291

第一
部
分

風險與幸福

1 不同年代香港人對風險的看法

梁世榮

本文要探究的，是不同年代香港人會否因成長環境相異，而對風險有不同的看法。著眼成長環境對文化價值的影響，Inglehart（1977）的後物質主義研究堪稱範例。綜述Inglehart（1981）的後物質主義理論，最宜用兩個假設：

- 一、匱乏假設（scarcity hypothesis）：人類的需求滿足依循Maslow的等級模式，即我們先追求次等需求如溫飽、安全的滿足，而後才追求高等需求如社會或自我實現的滿足。在次等需求不能夠得到滿足時，我們會賦予這些需求更高的價值。
- 二、社會化假設（socialization hypothesis）：成長時期的經驗會締造我們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會鑄造我們的人格，甚至終生不移。

* 本研究乃2006年香港社會指標調查計劃其中一個項目，經費來自香港政府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屬下的研究資助局（項目編號：PolyU5411/05H），謹此致謝。

二次大戰前，歐洲人飽受戰亂及飢餓等煎熬，但二次大戰後卻經歷了長時期的經濟、科技及教育的發展。依據上述兩個假設，戰前成長的歐洲人因次等需求之難以滿足，故會賦予溫飽、安全更高的價值；戰後成長的歐洲人因次等需求容易滿足，故會賦予社會或自我實現更高的價值。前後兩代人因成長環境不同而締造不同的價值觀，乃有從物質主義（materialism）往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轉移的文化現象。在Inglehart（1990:103）於1970至1971年的調查中，物質主義者和後物質主義者的比率為4比1，但在其1988的調查中，兩者的比率為4比3。此外，在其11個西方國家的調查中，一致的趨勢是愈年青的世代，後物質主義者的比重愈大（Inglehart, 1989:252）。Inglehart的後物質主義理論催生了許多研究，既有驗證其說法的（Lafferty and Knutsen, 1985; Knutsen, 1990; Taniguchi, 2006; Fuertes, 2009），也有質疑其觀點（Warwick, 1998; Davis, 2000; Butovsky, 2002; Brym et al., 2004; Ignatow, 2005）及其方法學的（Davis and Davenport, 1999; Seligson, 2002; Moors, 2003, 2007）。在以往的研究基礎上，Inglehart（1997）把其後物質主義理論擴展為43個國家的比較研究，從而確立其經濟發展、文化變遷及政治沿革都呈現一致及可預測模式之說。但正如Offer（1998）所言，Inglehart此項宏圖在統計分析上有隨意而為的毛病，而後物質主義一說偏偏和英美兩個範例的近年發展不大咬弦，實際上不少國家的模式更與後物質主義理論有相當出入。另Haller（2002）也指出，Inglehart的後物質主義量度中有些問題含意複雜、有些則指向不明，他把國家歸入不同文化圈的劃分更前後不一，至於宏觀及微觀分析之間的分野也不大了。Silver及Dowley（2000）以種族比較為軸，重新分析Inglehart的43個國家的資料，他們發現，國家之間在政治文化上的差異其實不及種族之間的分歧來得明顯。

Inglehart的後物質主義理論雖然面對種種理論上、方法學上及驗證資料不一致的責難，但就著因世代交替而產生的文化價值變遷而言，卻提供了簡明的研究切入點。我們曾在兩屆香港社會指標調查中借用Inglehart的後物質主義的四條問題，量

度香港人的後物質主義傾向。在1993年的調查中，物質主義者佔292位受訪者的75.0%，混合類型佔24.6%、後物質主義者僅佔0.3%（Ho and Leung, 1995:235）；在1995年的調查中，物質主義者佔349位受訪者的79.3%，混合類型佔20.0%、後物質主義者僅佔0.6%（Ho and Leung, 1997:333）。這兩組數字和一個1985年的研究相差不大：在1,000受訪者中，僅有1.4%稱得上後物質主義者（Ho, 1985:79）。這樣的研究結果，一方面顯示香港的情況有異於西方社會，即成長環境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改變了，但新一代仍賦予次等需求更高的價值。另一方面，這或可顯示從二次大戰後到1980年代結束，香港的社會經濟發展未足以改變新一代的社會化環境；易言之，新一代從家庭、學校、傳媒等重要社會化媒介（socializing agents）接收到的，仍是對次等需求的重視。無論如何，上引的三項研究分別完成於1980年代中及1990年代初中期，可能不足以捕捉長時間的文化價值變化。王家英及尹寶珊比較1992及2007年的調查資料，發現香港人中稱得上後物質主義者明顯增加，而後物質主義者也比物質主義者較支持新政治（如婦女運動、勞工運動及環保運動）及民主。不過，他們也指出，該項研究結果不足以顯示不同年代香港人之間的價值變遷（Wong and Wan, 2009）。

踏入新世紀，探索不同年代香港人對風險的看法，可能比探索他們有否轉向後物質主義更有意義。因為，從1990年代迄今，香港人面對的政治動盪、氣候變化、傳染病的威脅、勞動市場的結構性改變、金融風暴等，都是戰後前所未見的。這些問題，有些堪稱全球性的災難（如禽流感、非典型肺炎、全球暖化），有些如Beck（1992, 1999）的風險社會理論所言，是現代化及全球化所產生的風險（如全球工序遷移造成結構性失業），不少政治動盪更因為組織的不負責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所導致。如果成長時期的經驗會締造我們的價值觀，而香港人自回歸中國以來經驗了這麼多風險事件，不同年代香港人應該會因為成長環境不同，而對風險有不同的看法。

本研究以2006年香港社會指標訪問資料為基礎，回答以下問題：

- 不同年代的香港人會否對「風險」二字有不同的聯想？
- 不同年代的香港人會否對不同風險對個人生活及社會生活的威脅有不同的看法？
- 不同年代的香港人會否對不同風險出現的機會有不同的看法？
- 不同年代的香港人如何看不同風險的解決及社會資源的調配？
- 不同年代的香港人面對風險時會否有不同的回應行動？

要劃分不同年代的香港人，準則不一。本研究的著眼點在成長環境對風險觀的影響，背後的假設是不同年代會充斥不同類型、數量的風險，更不能不考慮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程度。這樣的話，則如上段所述，第一個最重要的分水嶺是1990年代之前及之後。但要成長在1990年代之後的一代香港人意識到風險，則他們必須在踏入1990年代時已是少年期，因此要把出生年期往上推至1976年或以後，即於2006年時年齡為30歲或以下為本研究的第四代。另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是二次大戰之前及之後，本研究以生於1945年或以前，即於2006年時年齡為61歲或以上為第一代。從經濟的發展角度著眼，則介乎第一代和第四代之間的，是成長於戰後重建的第二代（生於1946至1955年間，於2006年時年齡介乎51至60歲），及經濟起飛的第三代（生於1956至1975年間，於2006年時年齡介乎31至50歲）。表一是這四代香港人的綜述。¹

本文探索「不同年代香港人對風險的看法」，在方法學上必須釐清以下三個不同的概念：周期效應（periodic effect）、

1. 本研究的受訪者為18歲或以上的香港華裔人士，故第四代人的年齡應為18至30歲。又此研究實為呂大樂（2007）一書所觸發。該書把香港人分為四代，討論四代人面對不同的成長機遇及隨之而衍生的社會心態，頗有參考價值。

表一：四代香港人的劃分

	出生時期	2006年時的年齡	香港狀況	大眾傳播媒介
第一代	1945年或以前	61歲或以上	二次大戰	印刷媒介
第二代	1946-1955年	51-60歲	戰後重建	印刷媒介、電臺
第三代	1956-1975年	31-50歲	經濟起飛	電臺、電視
第四代	1976年或以後	30歲或以下	風險社會	電臺、電視(無線及有線)、互聯網(以手機上網)

生命周期效應 (life cycle effect) 及年代效應 (cohort effect) 。周期效應乃指在某一段歷史時空中，某些因素會對大多數人都產生共同影響。就本文而言，如果四代香港人中多數人都視香港為高風險社會，則我們相信連串風險事件的確對香港人產生了周期效應。生命周期效應乃指到了某一個生命周期，如青年、中年或老年階段，大家都會呈現那一個周期的生理、心理及文化反應。年代效應則指某一個年代因成長環境而締造獨特的價值觀，此價值觀甚至會成為這一代人的文化內核。就本文而言，如果四代香港人對風險的看法有出入時，我們較難斷定這些差異是生命周期效應還是年代效應的結果。易言之，我們很難論斷第四代年老以後會如第一代般看風險，也很難證實不同年代香港人對風險的看法會終其一生。要釐清這三個不同的概念，因為不同效應會導引不同的展望。一般而言，周期效應所帶來的影響是很難預測的，要視乎歷史事件所產生影響的本質。反之，生命周期效應和年代效應帶來的變化比較有迹可尋。無論如何，如Hellevik (2002:294) 所言，在橫剖性調查 (cross-sectional survey) 中，年齡是一個充滿歧義的概念，我們很難把年代和生命周期分割開來。因此，本文能夠鋪陳的是：可見的四代香港人對風險相異或相同的看法，至於那到底是周期效應、生命周期效應還是年代效應所致，則只能作出測度，而不能如縱貫研究 (longitudinal study) 般以資料來立論。

此外，我們不應忽略教育普及在第四代香港人所起的作用。在本研究中第一代的教育程度是2.41（即介乎小學與初中）、第二代是3.15（即初中）、第三代是3.91（即高中）、第四代是5.58（即介乎預科與工業學院/專業教育學院）。² 四代人之間的教育程度差異是顯著的（ $F=80.448$ ， $p<0.001$ ）。

四代香港人如何聯想風險

在2006年香港社會指標的訪問中，776位受訪者對「談起風險，你立刻想起的是甚麼呢？」這開放式問題給予91個不同的答案。表二是這91個不同答案的重組。明顯地，近半香港人對風險的即時聯想是有關個人的風險（如理財/生意方面、健康、就業、意外、退休、家庭、物業等），不足兩成人是有關社會或政治的風險（如經濟、社會、戰爭/自然災害、政治、房屋、環境、傳染病等），1.9%的答案很難歸類，而三成多人則沒有給予答案（甚麼也想不起、不知道/無意見、拒答等）。³

-
- 問卷中有關教育程度的答案選擇如下：無正式教育/幼稚園（給1分）；小學（給2分）；初中（給3分）；高中（給4分）；預科（給5分）；工業學院/專業教育學院（給6分）；專上：非學位課程（包括師範、護士、科技學院及各大專提供的證書或文憑課程）（給7分）；專上：學士學位課程（給8分）；研究院（碩士、博士課程）（給9分）。
 - Zwrick（2005）把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認真關注的稱作「滲透的風險」（pervasive risk），而為外界事件觸發的稱作「開動的風險」（switching risk）。為了更好掌握受訪者主觀意識中的日常風險，他提議研究者應在問卷初放置一條「風險調節因素」的問題。這正是本研究「談起風險，你立刻想起的是甚麼呢？」這開放式問題的由來。在訪問中，訪問員會把受訪者的答案如實筆錄，本文依據這些答案的表面意思加以重組。很難歸類的回答如下：生活開支、任何事情都有風險、怕亂說話得罪別人、保險、生活、祈禱、教育。

表二：香港人對風險的即時聯想 (%)

	主要類別	次類別
個人風險	47.0	
理財/生意方面		20.9
健康		9.8
就業		7.9
意外		4.5
退休		2.3
家庭		1.0
物業		0.6
社會/政治	17.5	
經濟		6.5
社會		3.1
戰爭/自然災害		2.7
政治		2.2
房屋		1.1
環境		1.0
傳染病		0.9
其他	1.9	
沒有聯想	33.6	
甚麼也想不起		21.0
不知道/無意見		12.4
拒答		0.3

不同年代的香港人對風險的即時聯想有否不同呢？從表三可見，每一代香港人都有超過六成、甚至七成對風險的即時聯想是個人的風險，其中以第四代人的76.1%最高，第三代人的72.6%其次，第一代人的66.7%再其次，而第二代人的63.5%最低。但聯想到社會或政治的風險則以第二代人的35.3%最高，第一代人的29.9%其次，第三代人的25.6%再其次，而第四代人的17.4%最低。卡方檢定的結果是顯著的。這顯然和四代人的成長經驗有關。四代人中，經歷二次大戰香港淪陷的只有第

表三：不同年代香港人對風險的即時聯想（%）

	個人風險	社會/政治	其他	(n)
第一代	66.7	29.9	3.4	(87)
第二代	63.5	35.3	1.2	(85)
第三代	72.6	25.6	1.8	(234)
第四代	76.1	17.4	6.5	(109)

$\chi^2=14.491$ ， $df=6$ ， $p<0.05$ 。

一代。但第二代及第三代都在求學（高中或大學）或發展事業的階段碰上九七回歸前後的政治及經濟動盪，舉其大者，即有中英有關香港的前途談判、從八八直選至今的政制發展爭議、多次金融風暴與傳染病的衝擊，及此起彼落的社會福利、公共房屋、交通基建、就業退休等民生議題的辯論。當然，重大的社會事件對人的衝擊會因生命週期、階層、性別、教育程度、職業等不同而有異，因此，1960年代的全港暴動與1990年代的香港回歸比較，可能更影響第一及第二代人對風險的看法。不過，如果二次大戰及全港暴動的經歷強化了第一代對社會或政治風險的關注，則九七回歸前後長達20年的政治及經濟的動盪，相信亦足以把不少第二及第三代人的關注從個人或家庭轉移到社會或政治上。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是以壹傳媒有限公司（包括《壹週刊》及《蘋果日報》）為首掀起的資訊娛樂化，及以「風波裏的茶杯」為代表的電臺phone-in節目掀起的批評政府風尚，這些肇端於1990年代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可說把政治經濟動盪從社會帶入戶內。但無論四代人經歷了甚麼風險，大多數人關注的都是和個人有關的風險。這是清晰而明確的結論。

四代香港人對風險的即時聯想既一致、又略有分歧的態度，也可見於他們怎樣看香港社會的風險狀況。從表四可見，在每一代香港人中，都有超過四成人認為香港是一個低風險社會。反之，認為香港是一個高風險社會的百分比，則從第一代的12.3%遞增為第二代的25.2%、第三代的31.4%及第四代的